

塑造「新人」的失敗實驗： 上山下鄉五十年祭

● 潘鳴嘯

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是個中外史無前例的社會實驗。在發動這次運動的五十周年之際，我們應該從比較深入的歷史角度去反思這個歷史事件的意義和教訓。筆者認為這次運動受到塑造「新人」這個烏托邦思想的影響，假如其發動者毛澤東不相信人是可以被徹底改造的^①，則很難想像他會在1968年底要求大部分受過中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且在各種因這次運動出現的大問題面前繼續堅持這個政策，直到他死去為止。

本文先簡單介紹毛澤東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的各種動機、「新人」的概念及毛澤東對這個概念的認同，接下來講述知識青年下鄉面對的實際狀況及他們如何抵抗做「社會主義的新農民」（即「新人」的一種），最後指出：雖然這個上世紀最後一次塑造「新人」的實驗以徹底失敗告終，但是有過這種特殊經歷的知青一代值得我們繼續研究。

一 上山下鄉運動的動因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可以分成兩個大階段，即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個階段是從1955年開始，到1962年已經有相當規模，並設有專門負責這個政策的機構，近150萬名知青下鄉；第二個階段是從1968到1980年，有差不多1,700萬名知青下鄉^②。雖然這個政策的動因一直是多元的，但是在兩個階段有明顯的差別。在第一階段，主要的目的是發展農村，特別是邊疆地區，以及解決城市青年的就業問題，但也有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動機。當時絕大部分的知青是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即所謂「黑五類」的子女；毛澤東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後，他們上高中、上大學，甚至在國營工廠當工人的機會極少，所以當局鼓勵他們下鄉勞動，以示願意改造自己，與勞動人民相結合^③。在第二階段，雖然

1968年有城市青年就業的現實考慮，但總體來說，政治和意識形態是最重要的動機。如果就業問題是主要的考慮，就很難解釋為甚麼從1968到1977年，農民進城並得到固定工作的人數和知青在鄉的人數基本等同^④。

文革前後，毛澤東的「政治掛帥」思想壓倒一切，提出並一直支持知青下鄉這個政策。早在1955年，他便說「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⑤。1968年12月22日，為了發動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發布了他的著名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⑥1973年，他給李慶霖回信的事件在當時引起轟動：李慶霖是福建省莆田縣的小學教員，給毛澤東寄了一封信，表示知青父母的困惑、揭發高幹子女靠權回城；毛澤東竟然給他親筆回信，信封裏附有三百塊錢。後來，中共中央召開大規模的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改善了一些政策，同時重新提高前三年明顯降低的下鄉知青人數。1976年2月，身體已經很孱弱的毛澤東還作出一個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書面指示^⑦。

1968年底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可以說是結束紅衛兵運動最徹底的辦法，但上山下鄉運動和紅衛兵運動卻是一脈相承的，屬文革的新生事物。一方面，上山下鄉運動是要「培養革命接班人」，讓城市青年繼承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事業」，避免他們變成「修正主義」的知識份子或官員，導致中國像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治下的蘇聯一樣變成「修正主義」國家，離開「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一直對知識份子有所反感和猜疑，而在紅衛兵運動終結時，

他顯然不滿紅衛兵沒有好好聽他的話，所以認為這些青年需要接受再教育。另一方面，上山下鄉運動也是縮小「三大差別」的措施，特別是城鄉的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⑧。

二 知識青年面對的 實際狀況

在毛澤東與宣傳部門的偉大理論背後，我們需要了解下鄉知青面對的實際狀況^⑨。當時城鄉的差別非常大，在中國歷史上，農村和城市一直都有生活水平及風俗習慣的差別。新中國成立後，這個差別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加大了，因為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向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學習其經濟模式，盡量降低農業產品的價格，為工業發展積累資本，特別是重工業的原始資本；另一方面為了全面控制人口分布，阻礙農民進城自己找工作，就建立了一種很嚴格的戶籍制度，結果是持城市戶口與持農村戶口的人有根本不同的待遇和命運。知青下鄉後，馬上失去城市戶口，沒有固定數量的商品糧食；他們要像農民一樣靠每天勞動掙工分換取當地農產。大部分知青靠工分吃不飽，既不習慣落後農村艱苦的體力勞動，又很難適應當地風俗習慣和貧乏的文化活動。因為不想在農村呆一輩子，就不願結婚。本來喜歡唸書或已經準備做某種工作的青年，下鄉後只能徹底改變自己的願望，對未來感到很徬徨。少數下放到國營或軍營農場的知青可以拿到固定工資（雖然工資很低，但對基本生存有保障），不過在其他方面和到農村「插隊」的知青差不多，而且來自農場領導的政治壓力更大。

在毛澤東的漂亮話語和偉大理論的背後，隱藏着一個殘酷的事實：如果所有城市青年真的都要變成「社會主義的新農民」，在實際的社會等級制下，等於整整一代城市青年下滑到一個待遇和身份比較低的社會層次。如果實際上不是所有的城市青年都要一輩子當農民，一部分人在經歷一段下鄉歲月後，可以在城市或軍隊裏得到待遇和身份比較高的職位，這對留在農村的「新農民」很不公平；而且當那些在農村結了婚、生了孩子的知青想到他們的命運會傳承給後代，必定就感到特別難受。

在當時看來，這次塑造「新農民」和「革命接班人」的實驗成敗主要的決定因素，在於毛澤東所代表的革命理想，即建立「社會主義新世界」的希望，能否給知青足夠的精神力量來克服各種各樣的物質和精神困難。

三 塑造一代「新人」的實驗

雖然上山下鄉是個史無前例的政策，但是中共領導人在運動初時，還是受到一場規模比較小和形式不完全一樣的蘇聯「共青團城」建設運動的影響^⑩。要了解為甚麼一個政府有意圖也有能力發動這類激進的社會實驗，應該提到從二十世紀20至30年代起，一些極權主義的政黨把徹底改變其國家的各個領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甚至徹底改變人本身作為最高目標。它們要創造「新世界」，也要塑造「新人」^⑪。筆者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正是塑造「新人」這個宏圖的一次大規模實驗。

「新人」這個概念源自基督教傳統（最先使用這個名詞的人是聖保羅

[Saint Paul])：認識了上帝以後，每個人都可以變成「新人」，告別有罪的「舊人」身份^⑫。此後，無數的信徒努力修身來達到這個個人目標。從十六世紀起，也有基督教徒企圖在小規模集體中塑造「新人」，如新教的加爾文(John Calvin)與在南美洲向土人傳教的天主教神父。後來，啟蒙運動哲學家也相信人的可塑性，認為國家有責任教育人民。第一個試圖用國家機器來塑造「好公民」的政治家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但他很快失去了權力和生命，這次實驗比較短暫。在十九世紀，馬克思也強調用教育來改造人性，特別強調這種教育也應該包括勞動的經歷。馬克思的理論對後來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很深的影響，但是最努力地強調徹底改變人民思想之必要性的當屬十九世紀後期的俄國粹主義知識份子。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在1861年出版的小說《怎麼辦？》影響特別大，書中第一次在現代政治論述裏使用「新人」這個詞；列寧後來說過，年輕時這本書對他的影響比馬克思著作還要大。蘇聯成立後不久，列寧在讚美「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時，呼喚「新人」的誕生。但在二十世紀20至30年代期間，蘇共不是唯一使用這個概念的政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與德國的納粹黨也在使用。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說要「重新塑造人」，希特勒(Adolf Hitler)也在德國塑造一個「最優秀的人種」。

「新人」的特點是他(她)能完全符合一個理想的模式，這個模式要配合「新世界」的成立。在道德和人格方面，「新人」要受到限制，甚至犧牲本性和愛好來服從代表公共利益和

人類未來的執政黨的指示^⑬：需要提高生產的時候，他拼命生產；需要對抗敵人的時候，他積極對抗。在斯大林治下的蘇聯，一個重要的「新人模範」是礦工斯達漢諾夫 (Alexey Stakhanov)；在1960年代的中國，最有名的「新人」是軍人雷鋒。這些人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新世界」。

四 毛澤東和「新人」

毛澤東一輩子致力於塑造「新人」^⑭，在還沒有變成馬列主義者前就已經想徹底改造中國人的思想^⑮。他在1917年給黎錦熙寫信說：「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⑯他也很快開始想辦法實現這個宏圖，參與建立「工讀同志會」，並模仿日本「新村運動」，計劃在湖南成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新村」。他後來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鬥爭，但一直沒有放棄改造全國人民的思想道德和改造社會的盼望。

毛澤東到了延安才有條件做這方面的實驗，整風運動即便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也算是一個相當突出和成功的塑造「新人」的實驗^⑰。1949年後，他仍然不斷發動新的運動來達到這個目標，包括文革等多場政治運動都旨在把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推向這個方向。毛澤東一直都要求中國人犧牲，把個人的一切獻給「人民」、「不怕苦，不怕死」、「鬥私批修」，等等。他塑造「新人」的方法特別強調「改造」這一方面，而且對知識份子的要求特別嚴格，要他們徹底改造思想，要他們「洗澡」和「脫胎換骨」。「脫胎換骨」原來是個道教的概念（正如「新人」原來是個基督教的概念）；

像古老宗教一樣，中共試圖用感情和「思想工作」徹底改變人^⑱。其中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強迫人寫檢討，交代自己的有罪想法和行動，這種嚴厲的自我解剖叫做「靈魂深處鬧革命」。這些手段一直到文革依然盛行，而且不但適用於知識份子，普通人與被認為「有問題」的幹部和領導人也得接受；在無數的檢討裏，犯過「錯誤」的人都要答應「重新做人」。毛澤東在1966年8月1日〈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中，便提醒紅衛兵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⑲。

一般馬列主義領袖都對社會主義「新人」的潛力非常樂觀。托洛茨基在1924年出版的《文學與革命》曾經寫過：「人將……創造出一種超人」，「人將變成無可比擬地更強、更聰敏與精妙……人的平均類型將高升到亞里士多德，歌德或馬克思的高度。而在此一山脊上將有新的高峰矗拔出來」^⑳。毛澤東也很早就有這種過於樂觀的想法，在1917年給黎錦熙的信裏說：「彼時天下皆為聖賢。」^㉑後來在大躍進的時候，他在兩首詩裏也表現了這種浪漫的空想，其中有兩句比較有名：「六億神州盡舜堯」和「遍地英雄下夕煙」。問題是這種對普通人的過高評價容易引起對他們的過高要求：毛澤東設定了脫離最基本常識的生產標準，而且不肯面對事實，堅持這些要求，這給中國人帶來了非常大的災難^㉒。1958年4月，毛澤東準備發動大躍進時寫了一篇很有名的短文，說中國「一窮二白」的狀況是好事，幻想像神一樣可以在這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畫圖」^㉓。這種徹底漠視實際和歷史經驗的英雄浪漫主

義，解釋了為甚麼一個領導人在試圖創造「新世界」和「新人」的過程中會對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但最有意思的是，大躍進徹底失敗的經驗沒有讓毛澤東放棄他對盡快創造「新世界」和塑造「新人」的希望和努力，反而在看到了中國「被迫」放棄他提倡的最激進的農業政策和蘇聯在各個領域採取比較謹慎的政策後，毛澤東就決定再往前推下去，於1966年發動了文革。毛澤東一輩子堅持創造「新世界」和「新人」的烏托邦目標，而且在每一次碰到釘子後仍繼續往這個方向推行下去。這可以說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表現，但也可以說毛澤東作為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這是一種保持自己的權力和歷史地位的需要。無論如何，文革是他實現這個企圖的最高峰。

五 文革中的「新人」： 紅衛兵和知青

毛澤東在1967年第1期的《紅旗》雜誌中寫了批語說：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②4}。這預示着文革是要創造「新人」的革命。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摘要公布的〈五七指示〉（即毛澤東在5月7日給林彪寫的信）可以說是塑造「新人」的最重要的綱領，也是創造「新世界」的最完整的藍圖；主要的理念是社會上各個行業的人要參加別的行業，包括在城市、在農村和在軍隊裏的人。當天《人民日報》的社論題目是〈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社論中很明顯地解釋：「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就可以培養出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全面發展的億萬共產主義新人。」^{②5}

毛澤東特別欣賞1966年出現的一個「新人」的形象：紅衛兵。他們一方面像雷鋒一樣絕對崇拜和順從偉大領袖，也準備為了他、為了革命犧牲一切，但另一方面也有毛澤東一直提倡的「造反」精神。他們願意毫無保留地打擊毛澤東給他們指定的階級敵人，勇敢地「造反」，但是這種「造反」是有限度的，是「奉旨造反」。1968年，毛澤東已經了解到不能一下子創造出按巴黎公社原則構造的「新世界」，也就不再希望紅衛兵繼續造反。既然要恢復秩序，「新人」的特點就不再需要包括造反精神，反而要強調聽話和反省，要他們接受再教育。因為一定不能回到1966年前的教育和經濟制度，也因為工廠沒法接納那麼多的新職工，最好讓紅衛兵一代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完全符合〈五七指示〉的提倡，而且其他非勞動階級的城市人（幹部和知識份子）也大部分要下鄉到「五七幹校」勞動。當然，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革命意義（即像「新世界」演進的程度）比起「五七幹校」政策更高。幹部和知識份子的下鄉是臨時的，他們沒有被要求變成農民，城市戶口和工資都得以保留。

1968年底以後的上山下鄉運動可以說是一個徹底改變社會、也徹底改變人的實驗，它的深刻意義是要改造整整一代人。那時候的口號就是要讓城市知青變成「社會主義的新農民」，要他們「當一輩子農民」，後來也經常要求他們「一輩子在農村扎根」，批評那些要讓知青「拔根」（即回城）的幹部和領導。當時的宣傳裏有很多文章教那些城市青年如何把自己改造成農民，如何把骯髒的工作看成是「最革命的」，意義是最神聖的，因為毛澤東對此最為贊成。

毛澤東相信一個人可以變成「新人」，可以在感情上由從屬一個階級的人變到另一個階級的人，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一位「新人」。1942年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過，他自己就是這種「脫胎換骨」的例子，在鄉下與農民和軍人幹革命的時候，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變成了無產階級的一份子。他說：「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²⁶

有意思的是，因為這一代年輕人從小接受毛澤東思想教育，基本上沒有碰到過別的思想，所以毛澤東要他們造反，要他們邊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邊打老師和階級敵人，他們大部分人都願意。當毛澤東要他們改變角色，很謙虛地與工農兵相結合，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也能接受。在文革前後，特別是在青年的革命情緒和毛澤東崇拜達到了頂點的1968至1969年，有相當一部分知青努力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情緒和「過去的舊我」，以便提高自己的覺悟，達到毛澤東所要求的水平。

1968年3月，在上山下鄉運動還沒有強制色彩的時候，一位北京知青寫信給朋友，很激動地說：「我終於在鄙視過去的舊我了！這是毛澤東思想對我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王國一次認真地〔的〕開火！我取勝了，我毅然決然地報名，願意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偉大的勝利！」²⁷顯然這位理想主義的青年要在農村找到自己的「新我」，但是這種情緒一般來說不會持續很久。雖然很多知青在農村呆了許多年，但這種「脫胎換骨」的「新人」並沒有在知青之中出現。即便在1968至1969年，有相當一部分知青自願下鄉，想在農村「大有作為」，繼續幹革命，但大約在鄉下呆了一年以後，他們「當一輩子社會主義新農民」的決心已經動搖，甚至一去不復返了。

箇中原因很多。筆者訪問過很多知青，也看過了許多回憶錄和知青小說，發現知青當時受到兩種衝擊：一方面發現社會主義農村還是很落後，



1960年代末下鄉之前，北京知青經常到天安門廣場舉行誓師大會，表示永遠忠於毛澤東，在農村堅持艱苦奮鬥，與貧下中農相結合。（圖片由潘鳴嘯提供）

另一方面發現農民的想法不像宣傳裏貧下中農的意識形態。按毛澤東1968年底的指示，他們下鄉的主要目的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受過這種教育應該會對他們改造成「新農民」有決定性的幫助。但大部分知青發現現實中的農民和宣傳裏的農民非常不一樣，所以他們很難認同現實中的農民；何況農民基本上不需要他們，也不認為他們會變成農民，知青就變成了一個不屬於鄉下也不屬於城市的邊緣化群體。

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對知青的思想衝擊特別大，不但因為那個毛澤東的「接班人」和「最親密戰友」、不斷鼓勵他們「聽毛主席的話」的統帥突然被揭露為一個「叛徒」，是對毛澤東有着超常智慧的形象的一種強烈打擊，而且事件發生後，當知青得悉林彪的〈「571工程」紀要〉（應該是他兒子林立果主筆的）裏有一句「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的時候，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人感到這個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裏，人的「改造」一直都有兩種方法：自願的和強制的。中國按蘇聯的模式建立了一個大規模的「勞動改造」系統，用體力勞動來改造犯人，包括政治犯。而上山下鄉運動雖然表面上是自願的（知青要報名），但實際上是強制的（無論是否自願，反正遲早要報名，不然當局會用各種辦法強迫報名）。在這樣的情況下，想回城但找不到辦法回城的知青，很容易感受到毛澤東強迫他們到農村辛苦勞動、接受再教育的做法與勞動改造很相似。這當然只會加強他們對做「社會主義的新農民」的抵制。

所以，大部分知青基本上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不滿意，抵制當一輩子社會主義新農民。最主要的問題是，他

們看不到自己在農村有甚麼前途；特別是過了幾年看到有些知青能回城，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城，能用甚麼途徑回城。雖然回城途徑是多元的，如招工、招兵、招生、困退、病退（即因為家庭有特殊困難，或因為有病不能在鄉下勞動，允許回城）等，但是沒有一個可以有絕對的把握。「走後門」是最有效的辦法，但也不容易，除非你是高幹子女；而且這個途徑也有政治問題，因為曾經有一個反對「走後門」的運動。大部分知青對現實不滿，想回城，但又沒有清晰的規則可以遵循。

六 在「無規則」的社會中 「退出」

我們可以用兩個西方社會學家的理論來理解當時知青面對的選擇。德國出生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在《叛離、抗議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中指出，個人對一個機構不滿，可以選擇退出或表達抗議，而這個人對這個機構的忠誠度會影響他的選擇²⁰。我們或許可以借用這個概念來理解知青當時的心態：對他們來說，除了在1978到1980年上山下鄉運動最後一段時期以外（下詳），抗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誰敢反對毛主席老人家的偉大指示？絕大部分知青都想退出，但怎麼退出是他們及其父母一個很重要的顧慮。

而在這個運動的特殊情況下，出現了一個赫緒曼沒有想過的可能性，就是以表示忠誠來尋求退出。當時，一個知青若表示其再教育已經成功，就是要表示他想一輩子留在農村。然

而，在城市得到一份工作或入讀工農兵大學最主要的標準是政治態度好，所以實際上一個知青愈是積極勞動和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愈是公開表示他要一輩子在農村扎根，就愈有機會早回城。據筆者曾經訪問的一位瀋陽高幹女兒所言，負責安排知青下鄉的幹部跟她說過：「如果你積極帶頭讓知青報名下鄉，而且到農村表示要一輩子扎根，我們擔保會很快給你安排城市的好工作。」雖然這種交易通常沒那麼露骨，但基本的情況就是知青中的積極份子比較容易得到回城機會。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虛偽的表現和犬儒主義情緒比較普遍。

知青面對的一個狀況是，雖然他們心裏的回城目標比較清晰，但是所有的途徑都不可能絕對把握。比如入讀大學，不能靠唸書考試，因為考試早取消了；只要勞動和政治表現好就可以入讀大學，雖然這些標準有點模糊，但可以盡量向這個方向走。然而實際上，因為名額不夠，經常還得靠別的途徑來達到目的，比如賄賂幹部、「走後門」等。自從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式的招生制度以後，「走後門」的風氣一直屢禁不絕。這些途徑有時成功，有時失敗。筆者認為知青面對的社會狀況，很像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社會分工論》（*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和《自殺論》（*Le suicide*）裏所用的一個概念，法文是“anomie”，英文是“anomy”²⁹。這個概念後來也被一些美國社會學家使用過，特別是莫頓（Robert K. Merton）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中文被翻譯成「失範」，原來在古希臘文中的意思是「無規則」。

在這種「無規則」或可以說是沒有客觀標準的社會中，知青的抵抗表

現就是利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來「退出」。「退出」可以分為心理退出和實際退出。心理退出就是非正式的，不符合當時官方要求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偷雞摸狗或投機倒把（當時做私人生意算是「投機倒把」，是非法的），在文化活動中不但對正統文化不感興趣，反而創造自己的次文化（或者說另類文化）。官方組織編寫了一些專門給知青閱讀的文學叢書，表揚知青模範和歌頌知青的犧牲精神，但是沒有很多知青看這些書。反而，在1970年代，有不少知青在鄉下看從城市帶來的禁書，甚至寫當時不能發表的詩歌和小說。這些地下文學作品成為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學復興的基礎³⁰。當時，官方也組織創作一些讚揚知青犧牲精神的歌曲，但基本上知青不唱這些歌，反而編一些懷念自己城市和家人、又埋怨農村生活辛苦乏味的歌曲。任毅因為寫了《南京知青之歌》被判死刑，後改成十年有期徒刑³¹，可見當時的領導人是多麼反對這種另類文化。實際上，上山下鄉運動大大增強了青年對正統文化的叛逆精神和對新理想的盼望。這是心理退出的結果。

政府利用了龐大的宣傳機器來反對知青各種「活思想」（自發的、政治不正確的想法）和「反動思想」，但是效果不理想。塑造「新人」的一個傳統手段是樹立典型的「模範」，宣傳部門推薦了不少「知青模範」來鼓勵知青徹底接受上山下鄉運動。模範主要的特點是堅決要扎根在農村，拒絕各種回城的機會；他們艱苦勞動，不怕苦不怕死，甚至有知青為了保護國家財產犧牲自己的生命（最有名的是金訓華）³²。但是這些模範的代表性非常低，而且他們很快就被迫捲入1970年代黨內務實派和激進派之間

的權力鬥爭。最終這些模範也沒有來得及變成「新人」，有些人在毛澤東去世後，甚至被認為是「四人幫」的餘黨，成為階下囚^③。

除了心理退出，實際退出也帶來深遠的社會影響。知青在「無規則」的社會裏要想盡辦法離開農村，就需要與其他知青競爭，這種競爭不能像考試評分那樣公開和公平。所以，知青不但沒有變成為革命犧牲一切個人利益的雷鋒式英雄，反而變成了為保護自己利益而奮鬥的「孟加拉虎」（這是張辛欣小說《在同一地平線上》裏的說法，當時不少小說和後來的一些回憶錄都談到了這個現象）。特別是在1973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以後，回城的辦法除了招工、招生和招兵，還有困退和病退；在這方面，當地幹部和城市有關當局擁有決定性的權力——想病退也需要醫生的證明書，所以一些知青及其父母不得不賄賂幹部和醫生來達到回城的目的，這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氣氛。有不少懷念毛澤東時代的人認為那時沒有腐敗，改革開放以後才有，這不符合歷史事實。雖然1970年代的腐敗情況不可能牽涉大量金錢（因為當時的社會很窮），但腐敗的普遍性已經比較高，因而人們開始抵制上山下鄉政策。另一個實際退出的辦法，就是非法回城，在城市當「黑人」，或非法越過邊界跑到國外。香港是最理想的目的地，很多廣東知青試圖偷渡到香港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這種非法和冒險的活動影響了廣東省的社會和政治氣氛。不少知青在偷渡時被捕，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在海裏失去了生命。

以上這些情況符合涂爾幹所講的「無規則」的社會狀況，但是他認為在這樣的社會裏，人不會有宿命論的傾向，宿命論只會出現在一些規則特

別嚴格的社會裏，因為人的選擇範圍極小，只能聽天由命。可是，當筆者採訪知青的時候，發現知青也有宿命論傾向，他們面對一個規則不清楚、不穩定的社會，無論用甚麼辦法來試圖達到目標，對自己的命運還是沒有真正的把握。所以這些原來當紅衛兵時要「破四舊」的城市青年，到了農村以後會相信算命，也會使用一些他們原來認為是迷信的方法來「轉運」^④。可以說，上山下鄉運動實際上是一種強迫性的遷移，知青不能公開躲避或反對這個命運，因而會有宿命論傾向。當一輩子農民對城市知青是一個過於苛刻的要求，特別是在1973年下鄉政策有所改變後，這個要求也不是絕對的，可以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來避免，所以他們也用「無規則」的社會中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辦法來避免陷入他們想抵抗的命運。

知青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經驗提醒我們，創造「新人」和「新世界」這個宏偉目標雖然一開始就靠一些有理想的政治家和活動份子調動積極性，但是從長期的角度來看，主要的基礎卻是嚴密的社會控制與強制性的行政手段。所以，我們即使看到很多年輕人「申請」下鄉，也好像接受了長期在農村當農民的命運，但不要輕易以為他們心裏都想變成「新人」。假如外在的壓力有所放鬆，我們會看到另一種局面。

七 公開的抵抗：「抗議」和「用腳投票」

對知青來說，公開的抵抗，即赫緒曼所講的「抗議」，只有在很特殊的政治情況下才可能發生。第一次公開抵抗是在文革第一階段，就是紅衛

兵運動的時候，很多文革前下鄉的知青趁紅衛兵運動的機會回城，聲稱上山下鄉運動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政策，要求馬上取消。但1967年周恩來重申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的政策，於是他們在1967年底被迫回到農村。知青的不滿情緒在1970年代偶爾爆發，特別是廣州白雲山事件。1974年10月23日，一大群廣東知青藉重陽節到白雲山登山，沿路喊口號、拿標語、放風箏來表達不滿，並聲稱打算偷渡到香港。這件事在廣州比較轟動³⁶。

第二次知青大規模地公開要求回城發生在1978到1980年之間。在幾個省份，特別是雲南和新疆，大批知青寫請願書、罷工、遊行示威、派代表團到北京，甚至絕食和絕水。除了在新疆有特殊情況以外³⁶，這個運動基本上成功了。當局雖然不想一下子結束這個運動，也不要所有知青回城，但絕大部分知青還是回城了，下放知青這個政策在1980年完全結束。在很多地方，雖然知青沒有公開反對下鄉，但他們「用腳投票」——大批知青回城，這個時候的回城風也被描寫成一次「勝利大逃亡」³⁷。

八 結論：最後的「新人」 是流產的「新人」

如果我們從毛澤東要知青「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變成「社會主義的新農民」，到知青長期採用各種消極抵制辦法和最後公開反對上山下鄉運動來看這個歷史過程，可以說這個在中國企圖塑造「新人」的實驗完全失敗了。不是說知青沒有被這個經歷改變，但他們沒有被改造成「新農民」，沒有變成犧牲一切個人利益、

為毛澤東所提倡的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的接班人，也沒有變成理想主義者，而是變成了提倡實事求是的人。他們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開支持改革開放政策和民主與法治的口號，重新發現了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些價值觀。實際上，毛澤東發動文革和上山下鄉運動的結果與他原來的宏圖完全相反。雖然後來的政治制度沒有徹底改變，但是上山下鄉運動實際上導致了烏托邦思想於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國的終結和社會力量的再生。

當時，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世界的絕大部分）早已告別了烏托邦，甚至告別了理想。斯大林在1930年代努力塑造「蘇維埃人」，從1950年代起已經沒有人再提。古巴共產黨在1968至1970年發動的「革命攻勢」企圖塑造以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為模範的新人，但是這個運動沒有堅持很久，比文革更早結束³⁸。所以，中國知青基本上是上世紀世界上最後的「新人」，也是最後的流產的「新人」。

也許有人會說在1970年代末有一個國家還在繼續試圖塑造新人，就是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1975-1979）。波爾布特（Pol Pot）確實是毛澤東的崇拜者，從毛澤東思想得到了一些靈感，把所有城市人遣送到農村，這可以說是一種極端的「下鄉運動」。但是紅色高棉有他們的特色，與毛澤東和卡斯特羅（Fidel Castro）不同的是，他們不相信人的可塑性。他們的概念不是「新人」而是「新民」：「新民」（或者說「新人民」）基本上只能是年輕人，而且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年輕農民；其他人就是「舊民」，一律沒得救，因為受了舊社會的腐化影響。在新社會，「舊民」沒有前途，不能把他

們改造成「新民」，只能消滅他們（或暫時利用他們像奴隸一樣工作）^{③⑩}。所以在幾年之內，紅色高棉不惜殺掉自己四分之一的同胞。波爾布特曾說：「只需要一二百萬年輕人就可以建設新柬埔寨。」^{④⑪}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是上世紀世界上最後一次塑造「新人」的實驗。雖然這次實驗是失敗的，但是知青一代（這次實驗的「小白鼠」）仍很值得我們去研究。他們沒有變成「新人」，卻被改造成一群耐人尋味的「舊人」。從1970年代開始西方對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以及從1990年代開始增多的中國學者的研究與千千萬萬的知青回憶錄，都或多或少表現和分析這些「舊人」如何保持人性，避開實際上沒有選擇的做「新人」的命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得到了很特殊的經歷，也或多或少反思了這個經歷。大部分人蒙受了損失，特別是絕大多數失去了唸書的機會，一部分人變成了殘廢，甚至失去了性命。因此，運動發動了五十年後，這個人類歷史上別具意義的一頁（塑造「新人」這個幻想的最後一頁）還是值得中外學者繼續研究反思的^{④⑫}。

註釋

① 關於毛澤東對「人」的概念最早的專門研究，參見 Donald J.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②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8-198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856；潘鳴嘯（Michel Bonnin）著，歐陽因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繁體中文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簡體中文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

③⑩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93-200；40-45。

④ 關於各種動機在不同時期的重要性，參見潘鳴嘯：《失落的一代》（繁體中文版，下同），第一到第三章（頁3-48）。

⑤ 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1955年），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527。

⑥ 〈毛主席語錄〉，《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2日，第1版。

⑦ 兩個受過教育的農村青年給毛澤東寫信，表示想在城市裏得到工作，對招工限於城市青年感到不滿。毛澤東在信上批示要求政治局商量這個問題，並準備重新召開工作會議，但因為唐山大地震與毛澤東去世，會議在1978年10月底才召開。關於上山下鄉運動的政策和管理方法，除了以上提到的著作，還可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潘鳴嘯：《失落的一代》，頁12-17；8；98-114；376-78；183-93；134-69；431-32。

⑩ 對知青面對的具體狀況，潘鳴嘯《失落的一代》第三部分（頁207-316）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⑪ 關於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對「新人」的概念和培養，參見 Yinghong Cheng,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這本書的貢獻很大，只可惜作者忽略「新人」的宗教來源和色彩。也可以參見程映虹：〈共產黨革命如何塑造「新人」——蘇聯、中國和古巴共產黨革命的比較研究〉，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data/49099.html。

⑫ 這個說法在《聖經》使徒書信裏幾個地方能找到。直到現在，天主教也鼓勵人做「新人」。從1946年起，法國有一份天主教半月刊名為《新人》（*L'Homme Nouveau*）。

⑬ 這種對「新人」或希望做「新人」的人的雙重要求（消滅自我和盲目服從領袖和組織）在傳統基督教裏

已經存在，參加任何修會的人都要做這個承諾。耶穌會要求成員「像屍體一樣」聽從修會領袖和教皇。

⑭ 吳迪：〈烏托邦實驗：毛澤東的「新人新世界」〉，《記憶》，第140期（2015年9月30日），頁2-38。

⑮ 當時很多知識份子，特別是年輕知識份子都有這種盼望。1915年出現的「新文化運動」和最有代表性的《新青年》雜誌就是例子。

⑯⑰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頁86；89。

⑱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特別是頁352-410。

⑲ 「塑造新人」的宗教來源和色彩值得研究，可以與中國歷代有宗教色彩的農民起義（特別是太平天國起義）找到相似的特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很難解釋為歐洲啟蒙運動或中國五四運動的後果。當然，這個問題超越本文的討論範圍。

⑳ 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1966年8月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8。

㉑ 參見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著，惠泉（王凡西）譯：《文學與革命》（香港：信達出版社，1971），第八章，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08.htm。

㉒ 關於大躍進所引起的大饑荒，參見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

㉓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77-78。

㉔ 參見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人民日報》，1967年1月3日，第1版。

㉕ 〈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軍三十九周年〉，《人民日報》，1966年8月1日，第1版。

㉖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1月），載《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853。

㉗ 〈巍巍給王中的信〉（1968年3月18日），載徐曉主編：《民間書信》（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頁35。

㉘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62。中譯本參見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李宗義、許雅淑譯：《叛離、抗議與忠誠》（台北：商周出版社，2018）。

㉙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著，渠東譯：《社會分工論》（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313-32；杜爾凱姆（涂爾幹）著，鍾旭輝、馬磊、林慶新譯：《自殺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200-36。

㉚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頁422-24。

㉛ 任毅：《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獄始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㉜ 這現象與整個社會氣氛有關，在一些保留傳統信仰的地方（如廣東省）則比較明顯。

㉝ Yinghong Cheng, *Creating the "New Man"*, chap. 3.

㉞ Paul Dreyfus, *Pol Pot, le bourreau du Cambodge* (Paris: Stock, 2000), 305.

㉟ 這個研究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研究有密切關係。參見Aihe Wang, "From Totalitarian to Utilitarian: The Coupling of Mao's New Man and the Liberal Old Self", *Society* 53, no. 2 (2016): 188-203。

潘鳴嘯（Michel Bonnin）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